

萧乾革新《小公园》

李楠 李传玺

这是萧乾先生入主大公报副刊后对副刊进行改造新推出的两个刊头,一个司徒乔设计的,一个是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。

1935年6月,萧乾先生从燕京大学毕业,随即进入大公报,编辑副刊《小公园》。

着手改版《小公园》

萧乾进入大公报,是老板胡霖聘请的。因为在这之前,萧乾先生已经在《文艺》等版面发表了好几篇有影响的作品。1935年初春的一个下午,胡霖来北平想找一个既能编副刊、又能兼管另外11个“由社会上的专家学者主编的学术副刊”的人。时在《大公报》和沈从文一起编辑《文艺》的杨振声先生把萧乾约去了。见面地点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。得知了胡霖的想法后,萧乾不仅答应了,竟还提出额外附加的要求:“要是我能预先先把《小公园》编出若干期,你肯不肯临时找人替我发发劳的副刊,放我做点外出采访的工作?”胡霖听了,“知道他收下的大概不是个懒汉,就眉开眼笑,一口答应了我这个要求,并且说定7月1日走马上任。”

接手副刊《小公园》后,萧乾立刻发现一个矛盾:拿起移交过来的稿子一看,才知《小公园》原来是个以传统曲艺及旧闻掌故为主的副刊,下面满是五花八门的广告,对这些,萧乾既不懂也不感兴趣。当胡霖问他接编的印象时,萧乾照实说“由我来编这样的刊物怕不对头”。没想到这句话正好说到了胡霖心坎上。胡霖当即表示:“你觉得不对头,这就对头了。我就是嫌这个刊物编得太老气横秋。《大公报》不能只编给提笔架鸟的老头儿们看。把你请来,就是要你放手按你的理想去改造这一页。你怎么改都成,我都支持你。”

萧乾说他一听这话,兴奋极了,“立即挽起袖子认真问起天下”,对《小公园》进行内容改革。一方面他通过《园例》等文章宣传自己的设想和取稿标准,一方面争取巴金、叶圣陶、林徽因、冰心、周作人、靳以、朱光潜、凌叔华、芦焚、李健吾等人支持。好在此时他在林徽因、沈从文等人帮助下已经完全融入了京派文人的圈子,并且得到了他们的首肯与好评。很快版面面貌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

可此时又出现了一个矛盾,刊头是对应原来版面内容的。原来的刊头很简单,左下1/3一条波浪形对角线,下面是一平静水面,点缀着三三两两露出水面的荷钱,中间浮着一只硕大的天鹅。确实是一角小公园的景象,但整个版面显得有些单调呆板。既然版面内容变化了,如此一刊头自然也得换。既然稿件有许多大家支持,那刊头也必得找相应的名家设计。



▲ 司徒乔设计刊头

为《小公园》设计刊头

萧乾首先把眼光转到从1934年初起在《大公报》主编《艺术》周刊的著名画家司徒乔。司徒乔很快拿出了作品。这是一幅夜晚北海公园图。一轮新月高挂,白塔静静地矗立,湖面微波中闪着银光,湖堤和山坡上全是黑沉沉的树林,只是在林隙间漏着星星点点月光。全图黑白分明,从面积上看各占一半,月牙、白塔、湖面和林隙间的月光为白色,在黑色的衬托下显得更加醒目,使得全图的意境更加幽邃沉静。画面看上去很规整,左半图黑多,右半图白主,中间一条水线隔开。但细看,又富有变化,右半图上面不规则水面与中间两边水线相连,显然白塔所在地是水中岛;左半图用“小公园”三个字和下面刊期的留白表示水面,显然湖堤也被湖水围绕,左右两半形成呼应,又使得整个画面被朦胧的水光月色所摇曳。整个设计艺术性很强,既有一种大写意的效果,又有一种木刻版面的精神,透着作者的精心构造。

后来冯伊湄的回忆看,这一设计来自作者这段时间的生活习惯与艺术创作手段的变化。他们当时住在什刹海冰窖旁边,每天黄昏,身患肺病的画家都要出外散步,“走出胡同口,向左是北海公园,向右是什刹海的荷花市场”。显然这一画面有着作者的深刻生活体验。此段时间,作者“发明一项不花钱的画具:拿人家用旧的毛笔,把毛摘掉,把竹管头削成钢笔嘴形状。利用竹管里为装笔毛而钻通了仅剩一圈竹皮的地方,用起来既富弹性,却又保留竹子的刚劲。蘸上墨汁,能得出挺拔的线条”,“能完全发挥他从中国画处学来的线的作用。它比之毛笔更有劲,比之钢笔更粗豪。他带着一罐墨汁,几支削好的竹笔,坐在茶棚里画速写每天都满载而归”。看此设计的线条,显然是他运用竹笔的作品。

7月14日,萧乾开始使用司徒乔的刊头设计。

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刊头

萧乾同时写信给林徽因,也请她帮



▲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刊头

助设计刊头。

1933年2月,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带领莫宗江等人前往山东考察孔庙,帮助国民政府拟制修葺方案。回来后,林徽因肺病复发,又移居香山疗养,夏天到后来,也是为了让林徽因更快恢复,一家又赴北戴河避暑。在那儿,林徽因说:“我感到我的身体已被肢解成一小块一小块的,再也不能把它集合成为一个整体了。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她接到萧乾的邀约信,设计了一个刊头画。

刊头画寄给萧乾时,她附了一封信,对如此设计作了简短说明,“现在图案是画好了,十之七八是思成的手笔,在选材及布局上,我们轮流草稿讨论。说来惭愧,小小一张东西我们竟然做了三天才算成功。好在趣味还好,并且是汉代,纯粹中国创造艺术的最高造诣,用来对于创作前途有点吉利”(1935年7月31日《大公报》)。这个过程表明二人没有草率随意的态度,还包含着二人的良好祝愿。

这个图案是什么样呢?一棵繁茂的大树是它的背景。并将前景划分稍显整一的阁楼加以贯穿且使之充满生机。阁楼下一热闹非凡的湖面,鱼跃水游,一条小船,后面一船夫在划桨,前面一个正匆匆划头收网。岸边台阶上到阁楼,阁楼加顶共三层,下面两层均有护栏,也均有人在观赏湖面,底层侧面一人是不是为了逗喂鱼鸟还在向湖面撒着什么;二三层两层阁楼短直,且有粗大拱木支撑,阁顶装饰着一只巨大的展翅欲飞的凤凰——真是一派熙熙和小公园景象。

整个构图是一分层的纵切面,有一种五彩缤纷、琳琅满目的感觉,是典型的汉砖雕刻的方式。梁思成在描述汉代建筑时说,阶基为中国建筑三大部分之一,汉代“重轩三阶”,“画像石与明器中之楼阁,均多有栏杆,多设于平坐之上”,“栏杆样式以矮柱及横木构成者最普遍”,“明器中有斗拱者甚多,每自墙壁出拱或梁以挑承炉斗”。和梁林二人同时来到营造学社,且和二人一道密切配合进行大量勘测的刘敦楨也说:“汉阙与绝大多数明器、画像石所表示的屋面与檐口都是平直的”,“并在脊上用凤凰及其他动物作装饰,这是汉朝建筑和后代建筑在

形象方面一个重要的差别”。看其设计中建筑营造的样式,岂不正是如此规制。

7月29日,萧乾推出了林、梁二人合作的刊头设计。

两幅刊头画的使用

7月31日,萧乾在编者话《关于图案》中郑重对这两幅刊头给予介绍,并对作者表示感谢,“在这里,我们得向两位艺术友人道谢,因为大热的天,他们曾费了许多心思为这小刊物计划‘报头’,使它能有一块漂亮的‘犄角’。星期日那幅有着湖光塔影的是司徒乔先生的手笔。若不是对这小刊物有着特别的宠爱,许多年来把全副功夫用到巨幅油画上的他,是不会答应做这风味别致的装饰画的。今天这幅壮丽典雅的‘犄角’是梁思成夫妇由北戴河为我们赶制出来的。天虽是热得要命,这图案却是在一丝不苟的努力下为我们设计的。”随后作者引用了林徽因的信。针对信中图案中“吉利”的祝福,萧乾先生最后说:“吉利不吉利可全在大家努力了。让我们在这精彩的‘犄角’下面铺起精彩的文章,切莫使这些宠爱变成错觉。”

随着副刊按自己意愿编辑出版步入正轨,萧乾如何使用这两幅刊头呢?

7月14日星期天首次在《小公园》推出司徒乔的刊头,21日星期天再用司徒乔图。由于之前的编者曾约了很多文章,胡霖吩咐,不能失约,还应该逐渐编出消化掉。萧乾在推出自己约来的稿件和按自己标准选出的稿件的同时,也在刊登原先约来的稿件。所以15日至20日、22日至26日又换成早先天稿图。也许是梁林图已到,过渡期基本结束,27、28两天再用司徒乔图,29日(星期天)开始用梁林图,至8月3日。自此,开始两种刊头一个星期轮换一次,至8月31日,《小公园》终刊。

《小公园》为什么终刊?萧乾晚年回忆说:“刊物是活跃了,然而《小公园》同《文艺》之间的分工和区别也消失了。杨、沈二位先是把平时的《文艺》交给我来编,他们只编星期日版。1936年上海《大公报》出刊后,连星期日的整版也交我来负责了。”既然两者之间的区别与分工消失了,那就只出《文艺》吧。此时《文艺》还在星期日才出,于是当《小公园》停刊时,《文艺》开始每天出一版。既然司徒乔、梁林两个刊头上面都标明了“小公园”,那每天新出的《文艺》既然不能再出。于是两个新邀约来的刊头也随之停用。

“1935年秋天,鲁西南大水灾,报上满纸登的都是灾情。一天,胡老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。那里已经坐了一位瘦长脸、瘦长身子的中年人。老板介绍说,这是画家赵望云。他要我们两人合作,赵画我写,深入到灾区。他问我的意见。我当然欣然同意了。他说,只要我把副刊编出几天,就可以成行。”随之,萧乾把工作重心移到灾情报道上,即使想再邀人画刊头也无心无时间了。于是每天出的《文艺》刊头就是单独的两个字而已。

虽然两个新设计的刊头使用时间不长,但萧乾革新《小公园》,三位文艺学家进行了一次完美合作,自是一段佳话,也为萧乾随后对大公报《文艺》副刊的一系列革新开了个好头,带来了广泛且震撼的效应。

(作者单位:安徽省委统战部)

文人轶事

WENREN YISHI

闻一多笑对“呵呵”

顾燕

1930年夏天,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向闻一多发出了热切的召唤,请闻一多来该校任教,闻欣然而往。

闻一多上课很有特色,对学生总是很宽容,宠爱有加。他总是抱着一大摞书昂首阔步地走进教室,学生起立致敬后,他便在讲台坐下,然后慢慢掏出一包烟,笑眯眯地问学生:“你们哪位吸呀?”当然没人吸,他就在学生的笑声中点上支,然后不紧不慢地开始讲课。

九一八事变后,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,青岛大学也爆发三次学潮。在每次学潮中,闻一多作为教授代表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。当时梁实秋也在青大,闻一多、梁实秋都认为学生应该认真学习,以便真正有效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,而不是盲目地停课请愿,并主张惩罚破坏校园学习秩序的学生。对此,梁实秋在《谈闻一多》一文中说得明白:“我们这一代人在五四时代都多多少少参加

过爱国运动,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当然明了,但是当时的形势和五四时代不同,所以平津学生纷纷罢课结队南下赴京请愿,秩序纷乱,我们就期以为不可。”为此,闻一多、梁实秋两人遭到了学生的激烈攻击。学生贴出标语“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”。梁实秋对此大惑不解:“不学无术”四字竟可以加在闻一多身上,真是不可思议!要知道,闻一多1912年入清华学校,1922年毕业留美专攻美术,1925年归国,所作新诗妇孺皆知,成名较早。

不仅如此,学生们还在墙上画了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,旁边写着“闻一多与梁实秋”。见状,闻一多认真地问梁实秋:“哪一个是我?”梁实秋笑曰:“任你选择!”闻一多平常讲课喜欢夹杂“呵呵”的声音,算是一点口头禅,学生抓住这一点也加以嘲讽,有人作了一首打油诗说:“闻一多,闻一多,你一个月拿四百多,一堂课五十分钟,禁得住你呵儿呵?”闻一多见状,这回真的只能“呵呵”了。

文人轶事

WENREN YISHI

“寡言君子”梅贻琦

王剑

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7年,深受师生们的爱戴。他为人重实干,寡言语,文质彬彬,时称“寡言君子”。

1931年,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,曾提出著名的“大师”与“大楼”的论断,彰显出他不同凡俗的眼光与胸襟。其实,梅贻琦治校,只有四个字:“无为而治”。换句话说,就是充分尊重教授,将“大师”的作用发挥到极致。梅贻琦低调谦和,从不专横独断,遇事总是先倾听教授和学生的意见,集思广益,择善而从。每次开会,梅贻琦到场后,就找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,只是静听,很少发表观点。看到教授们的茶杯里没水了,便起身续一下。会议即将结束时,有人问梅贻琦有什么要说的,他回答:“吾从众。”意思就是,我尊重大家的意见。

西南联大成立后,梅贻琦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,凡事均能做到不偏不倚,公正无私,一视同仁。清

华、北大、南开的教授共开出1600门课程,各有各的思想和观点,各有各的讲法。梅贻琦本着学术自由之精神,尊重每位教授,不强求一律,不厚此薄彼。一时间,西南联大名师风采,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蔚然成风。

梅贻琦生活俭朴,不搞特殊化。上任伊始,他首先取消了校长特权与津贴。在昆明,他与教授们一样租住民房。当时物价飞涨,梅贻琦微薄的月薪,只能撑半个月,吃饭往往都是辣椒拌白饭,连青菜都很少。梅夫人为补贴家用,不得不起早贪黑地磨米粉,卖“定胜糕”。有一次,梅贻琦去成都出差,已订好回昆明的飞机票。恰好有可乘的邮政汽车,他为给学校省200元钱,毫不犹豫退掉机票,改乘邮政车回昆明。

1962年,梅贻琦因病去世。人们在他入住医院的床下发现了一个皮包,里面放着一个账本,清清楚楚地记着清华基金的使用情况,每一笔都分文不差。

文人轶事

WENREN YISHI

谢无量卖文还债

秦千里

据《那时的先生》(中国文史出版社)一书记载,1946年蒋介石60岁时,曾通过空军司令周至柔请谢无量为他作寿文。当时的谢无量靠卖字鬻文为生,通货膨胀,物价飞涨,又加上一身债务,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

谢无量对周至柔既不答应,也不反对,一番敷衍。周至柔为表诚意,就先把润笔费给了三亿元。价格之高,远不止一字千金。谢无量那时正囊中羞涩,于是把蒋介石办黄埔军校、领导北伐及抗日战争3件事写成文章。

蒋介石看了寿文,心中大喜。周至柔又向蒋介石请示由谁誊写寿文,蒋介石说:“谢先生是大作家,就请他本人写。”

谢无量诗词文章做得好,字也写得好,其孩儿体碑帖贴于一炉,神清骨健,率性洒脱,天趣盎然。沈尹默曾赞曰:“无量书法,上溯魏晋之雅健,下启一代之雄风,笔力扛鼎,奇丽清新。”于是周至柔再次拜访谢无量,转

告蒋介石的意思。谢无量说,本人不擅楷书,怕是写不了。不承周至柔又敬献两亿元,作为写寿屏润笔费。钱多得不好意思拒绝,谢无量答应了。有了这两笔润笔费,谢无量还掉债务,还有剩余。

谢无量曾自我解嘲说:“他是出钱买寿文,我是出门不认。大家都在做生意,商场上往来,照例如此。”

谢无量为什么会有债务呢?跟他好赌有关。1931年,谢无量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,长住上海的一品香饭店,花钱如水,手头有钱就赌赌场,必输光后才回饭店。有一次,他与曾参加“一·二八”抗战的一位军官相遇于赌场,谢无量输了个精光。军官借给他500元,他又一掷而尽。谢无量只好笑着对军官说:“借款明天还给您。”这位军官久仰谢无量大名,就说:“先生不用还,送一首诗好了。”谢无量立即口占一首。诗的诗句说:“健儿海上夸身手,何止田横五百人。”一语双关,这位军官大喜而去。

贺敬之满怀激情高歌《回延安》

郑学富

“几回梦里回延安,双手搂定宝塔山。千声万声呼唤你——母亲延安就在这里!”每当谈起贺敬之这首情真意切的《回延安》时,我总是心潮澎湃,眼含热泪,被诗人眷恋延安的赤子之心所感动。

1956年3月初,贺敬之受团中央和《中国青年报》之邀,前往延安采访西北五省(区)青年造林大会。几小时后,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,然后换乘汽车前往延安。

汽车在黄土高原飞驰,路边掠过一棵棵刚刚吐出翠绿新芽的树苗,十几年前的一幕幕又浮现在贺敬之的眼前:1938年,贺敬之从山东峰县贺窑村(今属于台儿庄区)辗转湖北、四川追寻南迁的母校。1940年,16岁的贺敬之与同学徒步数千里,从四川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,17岁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,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,开始文学创作,并取得显著成绩。1946年,他渡过黄河,前往张家口……一阵高

昂的锣鼓喧声将沉思中的贺敬之拉到现实中来,热情的乡亲们敲着锣鼓,扭着秧歌来欢迎他们了。贺敬之在《重回延安——母亲的怀抱》(以下简称《重回延安》)一文中写道:“闪过去一座山、又一座山……终于,眼前的道路豁然开朗起来。一片毗连的房屋和层层相接的窑洞出现了。一条解冻的小河唱着向前流去——这就是和延河汇流的杜甫川!在那金色的夕阳的辉耀中,蓝天上高悬着那十几座古老的宝塔——这就是宝塔山!呵,母亲延安!分别了十多年的你的儿子,又扑向你的怀抱中来了。”

贺敬之在延安十几天的日子里,重游了杨家岭、枣园、王家坪、桥儿沟,好像回到了老家,回到了母亲身边,心情非常激动。“一条条街道宽又平,一座座楼房披彩虹;一盏盏电灯亮又明,一排排绿树迎春风……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,母亲延安换新衣。”这里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,他都感到特别亲切。乡亲们用米酒、油馍和炒菜等延安

的土特产热情地招待他,他和乡亲们抚今追昔,欢聚畅谈。他在《重回延安》中写道:“我被紧紧地围在炕上,我的手被左右的许多手拉着……不会醉人的米酒使我刚刚端起来像醉了一样。永远怀念的桥儿沟,永远怀念的延安的亲人们,让我们畅谈久别后的一切吧。”

3月9日,造林大会主办方向贺敬之约稿,请他写篇作品在晚会上演出。延安3月的夜晚还很冷,他彻夜难眠,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延安时期的战友和父老乡亲们的音容笑貌时时碰撞着他的记忆,他要高声歌唱,将洋溢在心中的浓烈情感抒发出来。他一边哼唱着一边写,一边激动得流着泪,一首66行感情充沛、脍炙人口的精美短诗《回延安》喷发而出。由于他炽热的心情忘记了寒冷,竟在不知不觉中感冒嗓子失声了,不能上台朗诵。在晚会上,表演者用悠扬婉转的“信天游”演唱了这首诗,令全场观众欢声雷动,群情激昂。

文人轶事

WENREN YISHI

刘海粟跟康有为学书法

周星

著名画家刘海粟经常怀着深深的感情和敬意对朋友说,他这一生中遇到了两个贵人,分别是康有为和蔡元培。

1921年8月,刘海粟同天马会的成员在上海举办画展,吸引了无数观者,康有为也慕名前来。他被刘海粟的油画《雷峰夕照》《回光》《樟》吸引住了,提出要见刘海粟。当刘海粟站在康有为面前时,他对眼前这个只有二十多岁的风度翩翩的青年赞不绝口。两人相约次日相见。

第二天,刘海粟来到了康宅。两人对历代书画家以及他们的书画作品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,并且还观看了欧洲的一些雕塑名家的作品。他们谈得非常投机,大有相识恨晚之感。康有为决定收他为徒,教他书法和诗词古文。几天以后,康有为为大宴宾客庆祝收刘海粟为弟子。赴宴贺道的都是学坛的巨擘。康有为当众为刘海粟讲书,并送他《书镜》一部。

从此,刘海粟每周五准时到康宅

(作者系贺敬之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)